

价值蒸发：协作生成物归属权的结构性消逝

当代协作经济呈现一个深层悖论：协作网络日益精密，参与者却普遍感到自身劳动结晶在贡献的瞬间便告消逝——不是被某个具体他者夺走，而是从生成之初就缺乏一种可将该贡献登记为生成者所有的社会形态。本文将此机制命名为“价值蒸发”，并论证其根源不在于制度性截留，而在于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承认缺失：当代协作正大规模生成一些既有产权语法尚无法命名的产物，而协作者在“若不将之立即注入可被承认的旧产权管道，则这些产物将在社会性上归于不存在”的恐惧驱迫下，不得不将未成形的果实送入管道。本文进一步论证，这一恐惧——命名为“虚寂恐惧”——本身并非一个先验的心理常量，而是被平台的实时评价、排名与淘汰机制持续再生产并不断强化的动力装置。

作者 葡萄 · 约 2.2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当代协作经济呈现一个深层悖论：协作网络日益精密，参与者却普遍感到自身劳动结晶在贡献的瞬间便告消逝——不是被某个具体他者夺走，而是从生成之初就缺乏一种可将该贡献登记为生成者所有的社会形态。本文将此机制命名为“价值蒸发”，并论证其根源不在于制度性截留，而在于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承认缺失：当代协作正大规模生成一些既有产权语法尚无法命名的产物，而协作者在“若不将之立即注入可被承认的旧产权管道，则这些产物将在社会性上归于不存在”的恐惧驱迫下，不得不将未成形的果实送入管道。本文进一步论证，这一恐惧——命名为“虚寂恐惧”——本身并非一个先验的心理常量，而是被平台的实时评价、排名与淘汰机制持续再生产并不断强化的动力装置。价值蒸发由此形成自激闭环：蒸发制造恐惧，恐惧驱迫注入，注入导致新的蒸发，而每一次循环都进一步削弱协作者对自身生成物在旧产权形态之外的承受力。对网约车司机老张与老赵的深度追踪，实证展示了这一闭环在个人默会知识与集体信任网络两个维度上的运作。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波兰尼的回弹框架、认知资本主义剥夺理论以及本科勒公地同行生产研究的系统对话，厘清了本文的不可还原的理论推进：蒸发处理的是“生产者的社会性生成过程被中断”这一本体论事实，而非单纯的“产品分配不公”。替代性归属形态的缺失，才是蒸发机制得以持续运作的结构性前提。

关键词：价值蒸发；虚寂恐惧；所有权；归属登记；协作经济；发生学

一、引言：驱迫的注入

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协作密度的飞跃。一条出行路线背后凝结着地图数据、实时路况、通信协议与无数前人的出行记录；一部智能手机整合着基础科学、开源代码、全球供应链的集体贡献；一座城市的运转倚赖着数百万日常微小协作浇灌出的商业生态与公共便利。然而，与这种深度协作相伴的，并非对“共同生成”这一事实的普遍自觉，而是一种日益弥漫的特定苦涩：亲手投入的劳动与关注，似乎在贡献的瞬间就消散了。不是被某个具体的人或机构夺走，而是像水渗入沙漠，消失在某种看不见的规则结构里，未能凝结成可持守、可指向未来、可由自己支配的“我的东西”。

网约车司机老张的故事为这种苦涩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入口。老张跑了两年车，慢慢摸出一组判断：他所在的城市有一条跨江隧道，早高峰从江北往江南极堵，但轻轨站设在江北入口旁，许多乘客只需被送到轻轨站而已。他发现，只要在早八点前等在隧道北口几个大型小区外围，就能接到大量前往轻轨站的短途订单。这段路很短，一单挣得不多，但周转快——送一个五分钟，回来又是新一单。早高峰跑下来，总收入反而比那些跑长途过江的司机高出不少。

这组观察——隧道北口、早八点前、短途轻轨站偏好——绝不是平台算法自动计算出的结果。算法在没有人反复跑出这个模式以前，无从习得这一判断。它需要有人去跑，把这个模式跑成一笔统计数据，算法才能加以学习并纳入优化模型。换言之，这组判断的最初发生，完全来自老张作为具体驾驶者在这个具体路段反复试验的默会认知。他的选择、他的取舍、他对潮汐人流的感觉——这些全部是由他的劳动所生成的知识。

那么，这组知识属于谁？在他打开App、踩下油门的那一秒，用户协议中的格式条款已经写定了答案：凡在本平台生成的轨迹数据、接单记录、行驶路径，其所有权归属于平台。这不是一个后来才发生的掠夺动作，而是App底层架构的出厂设置。老张的发现，从它诞生的第一刻起，就已经在技术上被预置于平台的产权容器之中。他不需要被告知，他只需要点击“同意”——那个所有用户都不会读、但必须点击的按钮。

而老张随后几周的遭遇，完整展演了这一预设如何运作。他连续多日在相同时段、相同地点高频接单，算法自动标记该时空节点的接单效率为高，并加大对附近司机的调度权重。不需要阴谋，这是常规优化。他跑出的模式，通过他自己的数据轨迹，被平台完全吸收。对老张而言，这组判断仍然只保存在他的个人经验里，没有任何可登记的形态。他没法为它申请专利，没法把它转让给别的司机收费，甚至没法阻止平台的学习——因为只要他用平台接单，他的位置、时间和行驶轨迹就已是平台的数据资产。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第二天继续按这个规律跑。然而，随着算法学习完成，这一时空节点会被调度给任何一个离隧道北口最近的空车。老张的先发优势，在几周内被悄然稀释——他跑出的模式，最终平滑地变成平台服务质量的一个标准子集，为全体司机共用，而他自己不再拥有任何特殊资源。

这就是一次完整的价值蒸发过程。但这只是故事的表面。真正令人生疑的事情发生在下一幕：老张感觉到了竞争压力的增加——以前一到隧道北口就有单，现在也要等几分钟。他不知道这是平台调度在起作用；他只归因于“最近入行的人太多了”或“我今天手慢了一点”。而紧接着的，不是退缩，不是懈怠。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寻找下一个“空白点”的劳动中——另一个时段、另一个地点、另一种乘客偏好的组合。他在没有被强迫、甚至带着某种破解城市秘密的隐秘兴奋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一台为平台寻找算法蓝海的终端设备。他的自我压榨，在情感上带有创造的快感——这一刻他感到自己是主人，他在“搞懂”这座城市。可事实上，他只是在自担风险、自我投资，为平台开发新的免费插件。

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剥削”或“截留”穷尽的问题了。剥削理论可以解释老张为何所得低于所值。截留理论可以解释平台如何通过数据产权将协作果实据为己有。但它们都无法解释这个最令人困惑的事实：为什么老张在被蒸发之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加倍努力地往同一根管道里注入新的劳动？如果只是“被剥削者有苦难言”，我们看到的应是消极懈怠、出工不出力。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主动加班、主动内卷、主动把最新摸索出的接单技巧上传到司机论坛。这不是被迫的消极，而是一种充满能量、仿佛在为自己积累什么的积极——可积累的结果，每一次都蒸发了。

主流讨论框架——收入不平等、平台垄断、算法控制——都在试图回答“谁夺走了果实”或“为什么没分到”。这些框架各自有其有效性，却没有一个触碰到那个更根本也更隐蔽的问题：蒸发能量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在驱迫着老张们，一次又一次地、甚至在明知果实留不住的情况下，仍然把自己的劳动往这个系统里塞？

本文要追问的，正是这股驱力的社会根源。它不在老张个人的心理弱点里，也不在某个坏制度的贪婪里，而在一个更基础的社会事实中：当代协作正在大规模生成一些既有产权语言还来不及为之命名的东西。面对这些尚未成形、尚未命名的生成物，协作者面临一种特殊的恐惧——如果不把它们立即塞进那个唯一能被社会承认的登记容器，它们就将在社会性上归于不存在。这股恐惧，驱动着持续注入；而注入本身，又保证了新的生成物继续缺乏独立命名的可能。本文的目标，就是追踪这个闭环的运作机制，并为其核心节点命名。

二、被悬置的刺点：谁看见了“劳动无法沉淀”，又转向了别处？

在展开核心论证之前，需要先与三脉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做一次不同寻常的对话。通常的文献检讨，以“前人留有空白，我来填补”为基本句式。这种做法隐含了一个未经审视的预设：前人框架是封闭而完成了的，研究者只需在边界处添上一笔即可。如果本文要论证的是一个具有本体论级差异的判断——协作果实蒸发的根源不在外在的剥夺，而在内在的社会承认缺失——那么就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思想史。

这种方式不是去问“前人漏掉了什么”，而是去问“他们看见过什么，但随后因为其自身理论结构中的历史性约束，转向了别处”。马克思、波兰尼、认知资本主义理论传统——这三脉思想在其最锐利的时刻，都曾真切地触及了“生成物无法在生成者手中沉淀”这个刺点。但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现场与问题装置，将他们引向了不同的追问方向。本文要做的工作，是回到这三个刺点，理解它们当时何以被转向，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激活它们——让那些被悬置的追问，在当前协作经济的经验现场中获得新的展开。

2.1 马克思：被悬置的“对象化短路”问题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核心机制，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延续到《资本论》，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的动作展开：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工人将自己的生命力量注入产品，使其凝结为一个可辨认、可使用的物。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个“物”构成了整个批判链条的起点：工人在产品中看见自己的存在，但这个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属于他，反而作为异己的力量站在他对面。剥夺的前提，是对象化曾经完成——产品必须先以“工人的产品”的形态存在哪怕一瞬，才能在下一刻被夺走。

马克思终生没有放弃这个起点。恰恰相反，他将它推到了极致：在《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价值形式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无一不建立在这个“产品具有可指认形态”的前提之上。这个前提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现场是坚实自洽的——他面对的是工厂的机器、矿山的煤炭、农田的庄稼，每一件都是有明确物理边界、可以指定“谁造了这个”的对象。他的理论不是“漏掉了”什么，而是在他所处理的那个历史阶段，这双眼睛恰好够用。

但本文所面对的经验现场，迫使我们追问一个马克思从未面对的问题：如果在协作产物从劳动中生成的那个瞬间，一个可以将该产物登记为“生成者所有”的社会形态根本不存在，那么“对象化”这个动作本身还会完成吗？老张的路线知识，不是一根别针。它没有人发明过一种社会承认的登记格式，能让老张指着它说“这是我的”。它不仅在事实上不属于老张，更根本的是——在法律与社会的承认真理中，它“作为老张的东西”这个陈述本身就不可说。马克思追问的是“产品为什么被夺走”，而本文追问的是“产品为什么从未以属于生成者的身份诞生过”。

这不是在说马克思错了。恰恰相反，这是沿着马克思打开的方向，追到了他当年不可能追到的那个环节。马克思看见了产品——那个工人曾拥有过一瞬、然后被夺走的产品——但他没有面对这样一种情形：产品的生成与所有权的登记在技术上被同一套出厂设置一体化了，以至于那个“工人曾拥有”的瞬间从未在操作面上存在过。本文将这种情形称为“对象化的短路”：不是对象化被异化截断，而是对象化本身被现有产权语言的结构缺失所阻断。这一笔，是本文对马克思传统的继承与推进——继承他对劳动与所有权关系的核心关切，推进他对“在技术中介下，所有权登记先于对象化完成”这一新形态的分析。

2.2 波兰尼：被压制的“保护冲动的偏转”问题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给出了一个极具解释张力的动态图景：当市场试图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时，社会自身会触发反向的保护运动。这股反向运动的能量，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欧美历史中，汇入了劳工立法、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一系列建制化成果。波兰尼的洞见不仅在于他看见了市场脱嵌的危害，更在于他看见了社会面对这种危害时的本能阻抗——不是被动的受害，而是主动的、有方向的抵抗。

但波兰尼的分析有一个隐含的历史条件：他所观察的那个时代，替代性的社会保护形态——工会、合作社、互助社、政党——具有相对成熟的组织传统与制度通道。当保护冲动被触发时，它有一个可以流入的、已经部分成型的水系。这不是波兰尼的“遗漏”，而是他所处历史现场的实际条件。

当代协作经济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情境。网约车平台深知司机将会为抵抗收入下降而拼命加班，所以在定价算法中已经预先吃下了这部分“自我压榨”的增量。教育竞赛的机制深知家长将为抵抗阶层滑落而拼命投入，所以在筛选标准中已经将此纳为常态。个体的反向挣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被预设为管道自我优化的燃料。保护冲动仍然在，但它失去了可以流入的替代性形态，于是被旧管道所寄生——它表现为“更紧地抱住旧产权凭证”，从而为旧管道注入更多能量。

这不是波兰尼的“回弹”失效了。这是回弹的能量在替代性保护形态缺席的条件下，发生了方向性的偏转。波兰尼预判了社会对抗市场的冲动，但这股冲动在当代协作经济中，因为缺乏可以承接它的集体所有权形态，被反向导回了它所试图对抗的那个系统。这一层偏转机制——保护冲动如何被自身所对抗的系统回收为燃料——是波兰尼当年的历史条件不曾出现、本文需要在此基础上推进的环节。

2.3 认知资本主义：被锚定的“被掏空的主体”问题

二十世纪末以来，以奈格里、拉扎拉托、维尔诺等人为代表的认知资本主义理论传统，对本文所面对的现场做了迄今为止最接近的逼近。拉扎拉托在《非物质劳动》中精辟地指出，当代资本捕获的不再只是劳动时间，而是主体的创造力、沟通能力、情感与品味本身。维尔诺的“诸众”概念进一步分析了后福特制下个体如何将自身最具特色的语言能力和思考能力投入生产，却被资本转化为公用的“一般智力”。这一脉理论的穿透力在于，它将批判的焦点从“劳动产品”移向了“劳动者的主体能力”：被掏空的不只是体力，更是灵魂。

但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在推进到这一步时，仍然保留了它自身的一个隐含前提——它预设了那个“被掏空”的主体，其能力在被捕获之前，有一个“原初归属”的状态。在拉扎拉托的分析中，资本“捕获”的是原本属于工人的东西。这个“原本属于”的时间性，尽管从未被明确理论化，但构成了整个剥夺叙事的前设：有一个主体，他有创造力、有语言、有情感，这些东西先属于他，然后被资本掏走了。正是这个前设，使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始终停留在“剥夺”的框架之内——只不过剥夺的对象从体力产

品升级为非物质能力。

本文要追问的是：这个“原初归属”本身，难道不是一个需要被发生学地分析的社会产物吗？在什么社会技术条件下，一项协作产物的“归属”可以从生成之初就被其生成者所认可？老张的路线知识在生成的那一刻，真的曾经“属于老张”吗？如果是，这种“属于”是在什么意义上成立的？认知资本主义理论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它默认了“归属”是一个自然事实——只要是人创造的东西，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创造者。但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看，归属从来不是自然的。它需要一整套社会承认机制——法律概念、登记格式、可查询的账本——来把它从“某种私人感觉”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事实”。这套机制，在当代协作经济的许多关键现场中，恰恰是缺失的。当这种机制缺失时，所谓的“原初归属”就从未在操作面上发生过。

本文并不否认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在整体方向上的敏锐。恰恰相反，本文继承它对“非物质劳动被资本捕获”的核心关切。但本文要在这个基础上前推一步：追问的不是“捕获怎么发生”，而是“那个被捕获者的‘归属于我’的感觉，在什么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而在什么条件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这不是在否定认知资本主义的分析，而是在将它所依赖的“主体原初归属”这一隐含前设，从默认背景中拉到前台，追问它的社会构成条件。这一追问所照亮的，正是既有剥夺框架无法容纳的那一层：协作果实不仅被堵在了“结果分配”的通道里，更被堵在了“生成者的社会性存在被承认为生成者”的开端上。

2.4 回到刺点：本文的问题位置

这三脉理论传统，各自在其最锐利的时刻，都触到了同一个核心张力：协作的果实无法在生成者手中沉淀。马克思看到了产品被夺走，但他的分析建立在产品曾经完整存在的前提之上——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现场赋予他的理论条件。波兰尼看到了社会的保护冲动，但他所观察的当代拥有相对成熟的组织传统承接这股冲动——那是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赋予他的出口。认知资本主义学派看到了主体被资本掏空的非物质性后果，但他们将“原初归属”视为一个给定事实，没有追问它本身在何种社会技术条件下才可能发生。

那个共同的、未被充分展开的刺点是：在每一种“分配”“建制”“捕获”的分析登场之前，协作参与者已经经历了更底层的一个环节——他们无法将自身的协作生成物，对应于任何一种独立于旧管道的、可被社会承认的归属形态。这个环节本身，需要被独立地命名和分析。它不是任何既有理论框架的“遗漏项”，而是一个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才能切入的发生学现场。本文的核心工作，就是给这个现场命名，并追踪它的运作机制。

三、价值蒸发：概念锻造与不可还原性校验

现在可以给出“价值蒸发”的严格界定了。它指的并非“创造出来的价值消失了”——没有东西凭空消失。它指的是，在当代深度协作的条件下，由于一种能够将生成者的具体贡献登记为“可持守的归属结果”的社会形态尚未长出来，个体的劳动结晶在生成之初就面临一个残酷的二元选择：要么立即注入既有产权管道以换取被承认的凭证，要么悬置于社会性上的虚空之中，不被任何承认体系所看见。无论选择哪一端，生成物归属于生成者的那个可能性，在操作面上都不存在。

蒸发的，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对象。对象确实在协作中诞生了——它凝结为平台市值的增长、路网效率的提升、服务质量的优化。蒸发的是归属本身的形成过程——是“这个生成物可以对应于其实际生成者的社会身份”那个可能性本身。当这一可能性被系统的出厂设置提前排除，生成者从协作中获得的，便只是一张“被承认曾经贡献过”的收据——工资、评分、积分、排名——而非所有权。

这个概念是否足以独立于既有理论？它是在何等意义上切开了“剥夺”“异化”“截留”和“外部性”所无法容纳的辨别面？以下逐层校验。

3.1 与“剥夺”的区分：从未发生过的“先属于我”

剥夺叙事——无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版本还是当代左翼政治经济学版本——都预设了一个微弱但关键的时间顺序：劳动先创造出一个产品，然后该产品被他人或他者所夺走。即便这个“先属于我”的瞬间短到只有一瞬、甚至纯属理论推演中的逻辑时刻，它仍然构成了剥夺成立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剥夺”就变成了一个无对象的动词。

本文的论证是：在平台经济的核心现场，这个“先属于我”的瞬间从未在操作面上存在过。老张从未以任何形式——哪怕是操作意义上的短暂形式——“拥有”那组被他摸索出的路线知识。当他踩下油门时，他的轨迹已经在技术层面上被定义为平台的数据资产；当他完成第一单时，这组知识已经被平台的数据架构收入囊中。他不是先拥有、后被夺。他是从一开始就无法拥有。

这个区分不是文字游戏。它改变了整个分析的方向。剥夺叙事追问“谁拿走了”，答案指向资本、平台、不公的分配制度。蒸发叙事追问“为什么生成者从未能拥有”，答案指向一个更基础的事实：协作所生成的东西，在现有的社会承认语言中缺乏一个可登记的形态。剥夺处理的是“权利的转移”，蒸发处理的是“权利生成过程的闭合”。二者不在同一个分析层次上。

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此时可能插话：这难道不就是“产权界定成本过高”所导致的正外部性无法内部化吗？老张创造了一组具有价值的信息，但他无法为这组信息建立排他性产权，因为信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界定成本极高，于是平台获得了正外部性收益。这个解释是完全自洽的——在发现学的框架内。

但这是两码事。“产权界定成本”的分析预设了：存在一个“可以被界定”的对象，只是界定它的成本太高。在这个预设中，老张的路线知识是一个“已经存在在那里的物”，只是通向它的法律手续过于昂贵。而本文要论证的是：这组知识在社会承认的本体论层面上，从未以“老张的知识”这个身份存在过哪怕一刻。它不是“存在但未被界定”，它是“在现有的承认语言中不可说”。苹果从树上落下，不是产权界定成本高的结果，而是重力作用的结果。老张的路线知识“归平台”，不是因为界定成本高，而是因为平台的出厂设置在技术层面上排除了“归老张”这个命题在语言上成立的可能性。这不是一个程度问题，而是一个种类问题。外部性分析处理的是前者——一个已被看见却未能被法律标记的对象。蒸发分析处理的是后者——一个在生成时就被预定无法以生成者名义被看见的对象。

3.2 与“异化”的区分：被打断的“对象化”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建基于“对象化”这个动作的完成。工人将自己的生命力量注入产品，使产品成为他的对象化存在；然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个对象化的产物与工人相分离，成为异己的力量。在这个结构中，工人与他的产品之间有过一次完整的照面——他在产品里看见了自己，哪怕随即被夺走。

本文描述的蒸发，发生在对象化完成之前。老张的驾驶轨迹和路线判断，从未以“老张的知识”这一可辨认形态在社会中存在过。不是产品被夺走了，而是那个可以被称为“老张的产品”的对象本身，从未在社会承认的界面上诞生过。他当然在身体上、认知上、精神上投入了劳动，但这些投入所生成的东西，在生成之初就被一个不属于他的登记格式所“赋形”——它的第一个可被社会辨认的形态，就是“平台数据资产”。从来不存在一个“尚未被异化”的状态——因为那个状态需要一个独立于平台产权的社会承认格式，而这种格式恰好不存在。

这层区分将分析推进到了比异化更深一层的位置。异化处理的是“生产者的产物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蒸发处理的是“生产者的生成物未能以生产者的名义进入社会承认”。异化预设了一个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丧失；蒸发指向的是一种从未有机会发生的归属。丧失的前提是曾经有过；蒸发的对象，是那个“曾经有过”的可能性本身。

3.3 与认知资本主义“捕获”的区分：被悬置的“原初归属”

认知资本主义理论——拉扎拉托、维尔诺等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当代资本运作的核心不再是占有已完成的产品，而是捕获生产者的创造力、语言、情感和社交能力。这无疑比经典的剥夺叙事更接近本文所描述的老张现场：老张被捕获的正是一组认知性的、基于默会知识的判断，而非一件体力产品。

但这一脉理论在一个关键节点上止步了：它预设了被捕获的能力“原初归属于”劳动者。在拉扎拉托的分析中，资本“捕获”的是“原本属于”工人的东西。这个“原本属于”从未被发生学地追问过。它被默认为了一个自然事实——只要是人创造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在前制度化地属于创造者。

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看，归属从来不是自然的。它需要一整套承认机制——法律概念、登记格式、可查证的凭证——来把“这是我的”从一种私人感觉转化为一种社会性事实。当这套机制不存在时，所谓的“原初归属”就只是在私人经验中存在的一个感觉，而不是在社会承认层面上的一個状态。老张当然可以在主观上感到“这是我跑出来的路”，但这种主观感觉在操作面上无法为他提供任何保护。认知资本主义理论把这种主观感觉当成了“原初归属”——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没有把“社会承认”这一环追到尽头。

本文的推进就在于追到了这一环。蒸发的不是“已经属于老张的认知产品被平台掏走”，而是“生成者的社会性存在，从未在一开始被承认为生成者”。老张作为一个生产者的社会身份，在那个具体贡献的归属界面上，从未被完整地发生出来。他当然是一个生产者，但他的“生产者”身份没有任何可登记、可被第三方查证的形态来为他作证。价值蒸发所处理的，就是这个社会身份被中断的节点。这一层，是认知资本主义“捕获”范式无法容纳的——因为它追问的不是“捕获了什么”，而是“被捕获者的社会生成过程何以被预先打断”。

四、虚寂恐惧：蒸发能量的来源——以及它自身如何被再生产

现在必须面对那个贯穿全文却至此仍未被核心命名的驱动力：是什么在驱迫着老张们，一次又一次地明知果实留不住，却仍将自己的劳动注入蒸发的管道？

4.1 命名恐惧

主流解释的第一候选是“生存压力”——不跑车就没饭吃，就这么简单。这个解释在描述上是成立的，但它不足以穷尽现象的全部形态。生存压力可以解释“不得不跑”，却无法解释老张在寻找下一个接单空白点时的那种隐秘兴奋——那种仿佛在破解城市秘密、在为自己积累某种优势的快感。生存压力也无法解释另一类反常现象：有些人退出了旧管道，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缓冲期后，并未感到解放，反而被一种更深的的不安所捕获——感到自己“漂浮着”，不确定自己还“算不算一个正经的社会人”。如果驱动他们的只是经济胁迫，退出之后应当感到的是如释重负；但他们感到的却是恐惧。这说明，在生存压力之下，还有一层更基础的驱力在运作。

这层驱力，就是本文所命名的虚寂恐惧——一种具有特定社会-技术根源的存在性不安：当个体无法将自身协作的生成物对应于任何现有的、被社会承认的归属形态时，所感受到的深层焦虑。引发恐惧的，不是物资的匮乏，不是人际关系的断裂，而是生成物在现有社会承认语言中的不可说性——你做了许多事，你的劳动凝结在了许多地方，但你在社会承认的账本上找不到任何一个条目，可以让它被登记为你自己的。

这个概念需要与它的一个最接近的邻居——吉登斯的“本体性不安全感”做一次严肃划界。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将本体性不安全感定义为个体在生活惯例被打断时感受到的深层不

安。他的分析立足于一个精确的社会心理学判准：日常惯例的自动运行维持着“自我的连续感”，惯例一旦断裂，个体就暴露在“我是谁”这个可怕的问题面前。缓解这种不安全感的途径，是恢复惯例——让人重新可以做他日常做的事。

本文的虚寂恐惧在根源上与本体性不安全感分属两个逻辑。吉登斯的不安全感源于实践的程式被打断——日常习惯做不了了。虚寂恐惧源于实践的果实无法被登记——成果在社会账本上留不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常规并没有断裂；管道极度鼓励你维持常规、优化常规。断裂的是产物与生成者之间的归属连接。老张每天照常出车，他的日常惯例运行得无比顺畅。他的恐惧不是来自“我不知道今天该怎么跑”，而是来自“我跑了三年，我跑出的那些经验、那些判断、那些我和每个老乘客之间积累的信任，到底在谁的名下？”

这一区分不仅在经验层面上可指认，更在逻辑上将本文的分析锚定在一个吉登斯框架无法到达的位置：吉登斯处理的是自我叙事连续性的心理危机，本文处理的是生成物与生成者之间的归属连接在制度语言中被阻断的社会-技术事实。前者是心理学的分析对象，后者是制度发生学的分析对象。虚寂恐惧的关键不在于“惯例断裂让人恐慌”，而在于惯例运行得越好，蒸发的果实越多，生成者就越需要往新果实中注入更多以维持“我还是在做事的那个人”的自我感知——而这就是自激闭环的动态起点。

4.2 恐惧的生产：管道作为放大器

然而，如果把虚寂恐惧当成一个蛰伏于每个人内心的、只要外部条件一触发就会释放的恒定心理常量，那就又滑回了发现学的诊断逻辑。老张在进入平台之前，他对“不被承认”的恐惧强度，与他在平台内跑满三年之后的强度，是同一个量级吗？显然不是。

平台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被注入的容器。它更是一台持续运作的恐惧放大器。实时评分系统——那五颗星、那一百分、那个在司机端App里无时无刻不在跳动的数字——不只是一套服务质量监控工具。它在操作面上执行着一项精密的社会心理工程：把“你被承认了”与“你没被承认”之间的界限，刻成一条每一单都在重现、每天夜晚都在结算的尖锐刀口。五星是暂时的——一个差评就能把几周的心血削掉一块。排名是相对的——你不仅要做好，你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否则系统就会在连续算法评估中降低对你的调度权重。淘汰机制是终极的大棒——续约时的综合评分如果不达标，你将直接被清理出这个唯一能够在每单结束时就给你一张社会承认凭证的系统。

平台并非“利用”了一个既有的虚寂恐惧。平台通过这套精密的日常反馈装置，系统性地放大了协作者对“不被承认”的敏感度，将其从一种模糊的背景焦虑，锻造成了一种尖锐的、持续在场的、与每一单营收直接挂钩的生存性驱力。老张进入平台三年后，他对“失去凭证”的恐惧不是变钝了，而是比他第一天跑车时更加敏锐、更加即时、更加没有中间地带。他比谁都清楚，他的“承认”随时可能被一两个差评颠覆，而他没有任何备份。

这一笔补足了价值蒸发的动力链中最要紧的环节。这个链条不是从“虚构恐惧→注入”开始的，而是从上一次蒸发开始的：

1. 蒸发机制——出厂设置的归属闭合——使得生成者的每一次新贡献都无法以主体之名在社会账本上注册。

2. 这使得生成者在主观上处于一种持续的悬置状态——他做了很多事，但这些东西不能说“是我的”。

3. 逃逸这种悬置状态的最短路径，就是立即拿到一张被承认的凭证——五星好评、高接单量、活跃度排名。这些凭证不能给他所有权，但可以在短期内为他确证“我在这个社会里还是被看见的”。

4. 而拿凭证这件事本身，必然要求他调用平台，在平台的记录系统里留下一笔可被计量的贡献。

5. 这笔新贡献，在生成时同样被出厂设置锁定在平台的产权容器里——于是新一轮蒸发发生。

6. 与此同时，平台通过实时反馈装置不断放大他在被蒸发前后的恐惧落差：每一次蒸发都在提醒他，失去凭证将意味着社会存在的损失；每一次好评又都在暂时缓解这种恐惧，建立一种“我还被看见”的条件反射。

7. 结果是：他在每一次被缓解后变得更依赖下一次好评，在每一次蒸发后变得更急切于下一次注入。虚寂恐惧不是被注满或掏空的容器，而是一个被平台反复充能的弹簧结构，每一次安慰都是下一次更锋利恐惧的预备。

这解释了两个表面自相矛盾的现象：为什么越做越焦虑（因为每一次蒸发都在放大恐惧），以及为什么恐惧越强烈，注入反而越加速（因为唯一可被感受到的缓解手段就藏在那同一根管道里）。这不只是受虐。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自我吞噬式的安抚：为了缓解被蒸发制造的恐惧，你必须加倍注入——而加倍注入恰恰制造了更多蒸发。

五、深描：两个维度的蒸发与被中断的承认

现在，将上述机制下沉到经验现场。以下围绕两个互补的维度展开：老张的个人默会知识蒸发（个人维度的归属中断），与老赵的集体信任网络蒸发（集体维度的承认生成失败）。前者展示的是蒸发如何在贡献生成的第一个瞬间就完成——它不是后来的事，而是出厂预设。后者展示的是，即便有人试图退出管道、建立替代性的归属形态，虚寂恐惧也会如何通过一种更精微的方式——社会合作者对“未被认证的承认对象”的不耐受——将这个脆弱的替代物瓦解掉。

5.1 老张：被蒸发追赶的个人

我们已追踪了老张的驾驶知识从生成到蒸发的完整过程：他在隧道北口摸索出轻轨站短途接单的策略性知识；这组知识在他打开App、踩下油门的第一个瞬间，就被平台数据架构预置于其产权容器中；随后，算法通过他的数据轨迹自动标记了这个时空节点的高效特征，并将调度权重分配给所有附近司机；老张的先发优势在数周内被稀释殆尽。

此处不再重复这一链条，而是要聚焦于老张在每一次蒸发之后的回应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本身，正是本文动力链中最容易被误读的一环。老张感觉到了竞争压力的增加，他将此归因于“最近入行的人太多了”或“我今天手慢了一点”。紧接着发生的心理反应，不是退缩，不是懈怠，而是一种充满能量的搜寻行动——他开始研究另一条路线、另一个时段、另一种乘客偏好的组合。他在这件事上投入了注意力、体力和试错的成本，却带着一种破解城市秘密的隐秘兴奋。

这不是受虐。这是他在这个系统里唯一能体验到“自己在做主人”的瞬间。当他研究路网、分析潮汐、试验不同的接单策略时，他短暂地摆脱了“被算法支配的零件”的感觉。他在“破解”这座城市，在用自己身体累积的经验和智慧，发现一个连算法都还没来得及标记的效率高点。在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解谜人，而不是平台调度系统中的一枚棋子。

恰恰是这种“做主人”的情感，构成了蒸发机制的致命糖衣。老张在研究新路线时投入的时间、试错的成本、身体的疲劳——全部由他自己承担。他自担风险，自我投资，像一个创业者一样思考行动。但他不是一个创业者——因为他没有任何可能将这次“创业”的成果登记在自己名下。他的每一次“破解”，本质上都是在用个人的体力和智力，为平台开发新的免费插件。平台不需要雇佣产品经理去研究路网优化——老张们会主动做这件事，并且在司机微信群里分享心得、交流技巧，仿佛他们是一个独立行会的匠人。

但这层情感糖衣的社会后果是精确的：老张在感到充实的那个瞬间，正进行着一项对平台最有利的劳动——新路线开发。他的创造快感，把那个本应令人警觉的事实——“我又在做一件成果归平台所有的事”——掩盖了。他以为自己在为自己打拼，而事实上，他只是在“为自己打拼”的情感体验中，高效地为管道生成下一批可被蒸发的素材。他不是被锁在系统里的囚徒——囚徒会偷懒。他是系统里最勤奋的志愿者。志愿者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囚徒。

这指向了蒸发机制对个体社会身份的更深刻后果。经过数次完整的蒸发循环后，老张作为一个独立生产者——那个本应拥有“我跑出了那条路线”作为其社会存在一部分的老张——其社会性生成过程被打断了。他当然仍然在跑车、仍然在赚钱、仍然在司机群体中被尊重。但那些可以构成“一个生产者的社会履历”的东西——首创了某项策略、积累了某种客群、开辟了某个新时空节点——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写入他的名字。他的社会存在，在协作经济最核心的生成性层面，是空白。他剩下的唯一身份，就是平台系统中一个拥有特定评分和完成单量的可调度单元。这个身份不含任何历

史，不含任何可以被带离平台的“我的成果”。他被承认的，不是他的生成物；他被承认的，是他符合了管道的运行参数。

5.2 老赵：承认形态生成失败的集体蒸发

老张故事所展示的，是个人劳动知识的社会性消逝。但价值蒸发的运作不仅限于个体层面。当协作者试图创建替代性的归属形态时，虚寂恐惧会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内化在每一个潜在合作者的日常选择中——瓦解正在生成的承认网络。老赵的故事揭示的正是这一点。

老赵在两年前建了一个熟客微信群，通过老乘客介绍新乘客，逐步拉起了将近五十个稳定客户。他在群里发出车时间，让乘客直接微信约他。模式一度成立：老赵不再完全依赖平台派单，有了自己的小客群，收入也稳定了一小部分。他想把这份关系网络积累成一种可以脱离平台而存在的、属于自己的“接单资本”。

网络在半年之后开始萎缩。萎缩的直接原因不是平台打压——平台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老赵的存在。萎缩来自协作效率的自然落差：微信约车无法即时匹配闲忙；客户临时要用车时老赵往往不在附近；老赵空车时又不知道哪个老客户刚好要出行。而更致命的，是这个网络面临着一个无法跨越的信任门槛。一个被老乘客介绍来的新乘客，看不到任何关于老赵的第三方信用档案。在平台上，他能看到一个司机的五星评分、完成单量、乘客评价——这些数字构成了一个可被即时查阅的信用凭据。而在老赵的微信群里，这些全部不存在。新乘客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试一次——来判断老赵是否靠谱。大多数人，不愿意为这种试错支付时间成本。他们宁愿等三分钟叫一辆平台快车，也不愿提前半小时跟老赵约车。

一种常见的解释将此归因于技术效率：老赵的“产品”在与平台的“更优产品”竞争中落败了。这种解释把老赵的熟客群视为一个交付给市场的完成品，然后因市场选择而被淘汰。但发生学的追问要沉得比“竞争出局”更深一步：老赵这个网络，为什么在它存在的半年里，从未能发展出任何一种粗糙的、共用的信用登记？为什么一个“赵师傅口碑接龙”、“老乘客点赞数排行榜”、“约定准时率统计表”——任何一种最原始的、哪怕是手动的、半公开的承认标记——都没能在这个网络内部长出来？

问题的答案不在技术可行性上。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些机制简单到只需要一个共享文档。答案在时间性上。要长出一种哪怕是最粗糙的、被群内成员共同认可的信用标记，需要一群人在一段时间内反复使用它、修正它、在它失效时仍然愿意等待下一次改进，而不是直接退回平台。这个“一段时间”，就是虚寂恐惧最不擅长对付的东西。当乘客临时需要用车、老赵不在附近时，他们打开平台App的那个动作，在经验上是一个瞬时决策——但对整个替代性网络的后果而言，这笔瞬时决策是一张退出票。每一次打开App，都在做两件事：救急，和巩固平台作为“唯一可被即时信任的凭证提供者”的地位。越巩固，越无法脱离。这就是“不耐受”——不是人格缺陷，是一种被平台训练出来的、对“未被认证的承认对象”的即刻拒斥。这种不耐受的內化，使得替代性承认网络的生长过程在

最脆弱的早期就被不断截断：它所需的协作密度，恰好因为它的暂时不可靠而无法积累——而没有积累，它就永远到不了“可靠”那个阈值。

老赵与他的乘客们共织的那张关系网，他所积累的每一次准点到达的口碑、每一次暴雨天接单的可靠印象——这些关系的果实，始终被锁在一个极为脆弱的形态中：微信群里的消息记录。而这种形态，在旧管道的产权和信用语言中是完全透明的，是不可见的、不被承认的。它们从未能以“老赵的劳动成果”的身份在社会账本上获得哪怕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独立条目。所以它们消散了。不是因为老赵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和乘客们集体织出的那点东西，被扔在了一个没有第三方愿为其做担保的真空地带。虚寂恐惧——对未被认证的关系的深层不安——把每一个曾短暂离开平台的乘客，又推回了平台的账本前。而这些账本上印着的，从来不是老赵的名字。

5.3 两条蒸发的交点：归属中断的结构条件

老张与老赵的故事，在具体经验上是两条不同的线索：一个蒸发的是个人知识，一个蒸发的是集体关系。但二者在这一刻交会：协作所生成的东西，在现有的社会承认语言中找不到一个可被登记的条目。老张的路线知识，不属于“知识产权”的法定种类——它不是发明专利，不是著作权，不是商业秘密。老赵的熟客网络，不属于任何既有的“资产”类别——它不是商誉，不是股权，不是合同权利。它们都是协作的果实，但它们是既有产权语法不认识的物种。

管道之所以能稳固地占据“唯一登记容器”的位置，不是因为它赋予了管道持有者某种超然的权威，而是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种能够即时提供被社会普遍承认的登记凭证的机制。平台评分是即时的，地契是坚硬的，学历证书是通行的。而替代性的归属形态——互助社的信用、合作社的份额、开源社区的署名——要么处在极其边缘的试点阶段，要么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积累社会承认。当协作的果实直接关乎基本生存时，协作者等不起。他们必须立即拿到凭证。而“立即”与“替代性形态”之间，存在一个无法被意愿跨越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就是虚寂恐惧的生产线：每一次“等不起”，都在加固那唯一的登记容器，同时也在消耗人们“下次再试”的耐心。

六、推衍、对照与边界：在更广的场域中定位蒸发

现在，将“价值蒸发—虚寂恐惧”这一核心机制推衍至三个具有结构同构性的邻近领域。推衍的目的，不是把价值蒸发打造成一把万能钥匙，去解释一切。恰恰相反，每一次推衍都要求回到虚寂恐惧在那个领域的源头位置，同时在对照中精确地划出它的适用范围。而在本节末尾，将对本科勒公地同行生产理论做一次更深入的对照分析——通过分析一种“未发生蒸发”的协作形态，从反面确证蒸发的发生条件。

6.1 教育竞赛：养育付出的归属悬置

家庭教育中的某些微观现象，与网约车案例构成了精神上的结构同构。一位母亲几年来陪伴孩子阅读、深聊话题、培养追根究底的习惯。这些投入——时间、注意力、情感上的疲惫与充实——是真实的劳动。它生成了某种东西：孩子的好奇心、独立思考的倾向、对新知识的自发兴趣。然而，在现有的社会承认机制中，“教育成就”唯一被广泛认可的登记形态，依然是阶梯化的、可量化的符号凭证——学历排名、竞赛获奖、升学去向。

那些无法被转化为这一形态的付出，便在家庭的经验中面临着归属悬置。这位母亲终究要面对一个她无从躲避的焦虑：如果这些付出不能表现在下一张入学通知书上，她拿什么向自己、向家人、向外部的亲友证明——她这些年的付出是“有效”的、是“值得”的？这份焦虑不是共享的亲子喜悦消失了——她确实与孩子的共处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快乐。蒸发的是归属的痕迹：她在孩子成长中的那部分贡献，无法以她自己的名义，被登记为一段独立可陈述的养育成果。它必须经过阶梯凭证的公证，才能在社会的目光下现形。

虚寂恐惧在这里的表达，是一种特定的恐惧——不单是怕孩子“没出息”，更是怕自己这些年的付出在社会承认的坐标系里“不算数”。而逃逸这一恐惧的最短路径，就是把养育投入的全部重量，都押注进升学竞赛这根管道——用一张地契般的学历凭证来为整个养育过程做一次总决算。而这条路径一旦成为唯一路径，母亲就越发没有余裕去为孩子或自己创造另一种衡量标准。每一次“为了孩子将来有个凭证”的努力，都在消解“养育本身就可以有独立于凭证的可陈述价值”这一可能性存在的空间。蒸发的不是孩子成长出的大部分素质——那些素质仍然在，孩子仍然有好奇心、有思考力。蒸发的，是母亲在承认语言中对自己付出的可申述性。

边界：此处所做的分析仅限于一种特定的结构化后果——当养育投入缺乏独立的社会归属形态时，外部阶梯评价容易成为唯一可被看见的登记手段。它不在宣扬“取消考试”或“不去努力”，也不否定许多家庭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深层亲子满足。一位满足的母亲与一位焦虑的母亲，在归属语言缺失的结构中面临着同一个机制，区别只在于她是否感受到痛苦。蒸发的判断是结构性的，而非心理诊断。

6.2 数字劳动：关系网络的不可携带

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与内容社区的创作者，正处于一种持续运作的价值蒸发结构之中。一个创作者持续投入创意劳动——拍摄、剪辑、文案、对受众心理的反复调试——最终为自己积累了一批紧密的跟随者和持续的互动黏性。这批关系网络的成型，当然有平台技术设施的一份功劳——推荐算法触达了潜在受众，后台数据为精细运营提供了依据。但驱动这个网络生成的主体性来源，仍然是创作者的劳动本身。

然而，创作者积累的这批关系网络，无法被打包带走。粉丝的信息、互动记录、社群黏性，全部以平台使用的后台数据为唯一可查证的形态；创作者本人无法将其导出，无法将其转化为可携带的、跨平台有效的社会资本——比如，一个独立于平台之外的“创作者声誉指数”。离开平台，他之前积累的全部社会承认、全部互动纽带，在瞬间归零——不只是收入归零，更是社会性存在的归零。

这个归零，就是虚寂恐惧的精确触发器。他越是清楚自己的所有积累都绑定在一组他并不拥有、甚至无权备份的数据上，就越不敢退出。而缓解这种不敢退出的恐惧的唯一方式，是继续注入新内容——更新、追赶热点、与评论互动、维持系统判定为“活跃”的数据指标。他在为自己积累声誉，但这份声誉的唯一账本，记在平台名下。

边界：这不否认平台为创作者提供了真实的价值——流量、分成、触达。平台回报可以是丰厚的。但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产生这些回报的基础——他的粉丝网络和他的创作历史——其所有权形态始终被平台垄断。当创作者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却没有这些基础的所有权时，他只是一个高收入的分成者，而非一个拥有自身生产性社会存在的独立主体。一旦平台的推荐机制发生改变——改变恰恰是平台的特权——他多年积累的劳动结晶可能在数周内归零，没有任何可以独立追索的凭据。

6.3 中产焦虑：终身勤勉的凭证化

将视角拉到更宏观的尺度。普通中产家庭的再生产维系，依靠的是终身学习、职业深耕、育儿规划、人际经营等一系列复杂的、难以度量的长期投入。这些投入所生成的东西——技能、人脉、抗风险能力、社区贡献——部分可以在已有私有产权形态中被兑现为个人资产或职业晋升。但那个部分，并不能容纳终生投入的总和。

当公共产品——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不断以金融化产权形态被私有化之后，中产家庭劳动生成贡献的相当一部分，便被导流进了对私有产权凭证的竞标游戏。为了“拥有一套不会被赶走的住所”、“获得一张不会被雇主过滤掉的文凭”、“购买一份可靠的商业保险为老年托底”，中产家庭不得不把自己终身勤勉的绝大部分，在生的每一刻都以远超基本生存所需的劳动强度，注入到地产、教育和金融管道的产权竞标之中。

在此处蒸发掉的，不是全部努力。一部分确实转化为了家庭资产。蒸发的，是那些无法被已有凭证吸纳的剩余——那种“我这辈子到底做了什么、这些事算不算我的”的存在性结算。这个总结算没有独立的登记形态，只能以“资产总额”“子女学历”“社保年限”这些旧管道凭证来代偿。虚寂恐惧在中产心理中的表征，由此被高度细化成一种特定的焦虑：“如果不挤进这根管道里，我这辈子就白辛苦了。”这个“白辛苦”的恐惧的核心，不是怕穷，而是怕自己的一生投入，在可以随时向社会交出的账本上，留不下一个可以自证的条目。

全局边界：本文并不声称“所有人类努力都在蒸发”。亲密的友谊、审美共同体、宗教与灵性实践、邻里互助——这些领域的协作果实可以在不依赖旧产权容器的情况下被本地的承认网络所沉淀

，因为它们的归属机制不绑定于经济性所有权。一个电影俱乐部对某部影片的集体解读、一个灵修团体内部的长期精神陪伴——这些东西不会蒸发，因为当事人相互构成了彼此的见证者，不需要一张外部产权凭证来做总的公证。价值蒸发的理论边界在此处是硬的：它只在那些无法依靠非产权的本地人际网络独立完成社会承认登记的领域里，才构成有效的分析透镜。当劳动的历史生成物需要跨越本地承认网络、进入更广泛的社会性承认系统才能被“看见”时，蒸发的条件就成熟了。超出这个边界，本文的分析力退场。

6.4 对照：为什么开源社区的劳动没有蒸发

在划定了蒸发的边界之后，一个至关重要的追问仍然立在前面：为什么有些同样大规模、同样依赖数字平台的协作——最典型的是本科勒所命名的“公地同行生产”，如Linux内核开发和维基百科——没有发生价值蒸发？

常规的答案有两种。一种指向劳动的性质：老张的路线知识不够“创造性”，只有像编写操作系统内核那样的智力成果，才配拥有署名权。这种解释预设了“创造性劳动”和“执行性劳动”的本体论差异，但老张的默会判断和Linux贡献者的代码调试，在其各自的生成性维度上，并没有本质性的高低之分。另一种答案指向经济压力：Linux贡献者大多是志愿者，有别的收入托底，所以可以承受果实不被立即兑现。这个解释是对的，但它没有说透——没有说透“别的收入托底”在发生学上究竟架空了哪一环节。

真正关键的差别，不在人的能力，不在人的动机，而在劳动过程与登记技术之间的制度性关系。在开源社区中，贡献者的劳动过程与登记过程是技术性地耦合在一起的。git协议本身——每一个提交（commit）都带着署名、可追溯、自动进入公开代码仓库——构成了一个与劳动动作同步进行的实时登记系统。贡献者敲下代码的那一秒，他的署名已嵌入区块链般的提交历史中，不可篡改、公开可查。他的劳动生成物，在生成的同时就被一个独立于任何管道持有者的公共账本登记了。他并不“先劳动，后署名”。他劳动的动作——git commit——本身就是署名的动作。

反观老张的劳动。他的路线知识、他的默会判断，其生成过程与他可用的登记工具之间，是彻底脱钩的。他的大脑在判断、他的身体在开车、他的数据在生成——但登记这些数据的唯一技术接口被平台垄断性控制。他无法用一个“git commit”般的动作，将他的判断与他本人的社会身份一同嵌入公共记录。他可以事后在微信群里说一句“我发现了那个规律”，但微信群里的消息记录不是公共署名——在产权语言中，它不具备“登记”的法律效力，在技术面上也不能防止平台从数据层直接吸收。

这不是经济压力大小的差别。这差的是，劳动过程本身有没有被赋予一套独立于管道持有者的登记技术。当劳动与登记在技术上是同构的——如git之于代码——则即使没有金钱回报，生成者的社会身份仍然在每次提交中被确认，归属没有被悬置，虚寂恐惧找不到栖身之所。当劳动与登记在

制度上是分离的——如在所有平台独占数据的协作场景中——则哪怕金钱回报持续到手，归属仍然在生成之初就蒸发，恐惧仍然在每一轮循环中被强化。

这一对照表明，蒸发的关键条件不在于“赚不赚钱”，而在于协作过程与承认过程是否被同一套产权管道垄断性地整合。在那些承认过程与产权管道脱钩的协作形态中——即使管道持有者消失，承认仍在本地账本中存续。在那些承认过程与产权管道一体化的协作形态中——即使回报丰厚，承认只在管道内部有效，一旦管道改变规则或被替换，全部承认随同归零。老张与Linux贡献者之间的根本差异不落在“创造性”或“经济压力”上，而落在劳动与登记的制度性耦合这个发生学的基岩上。

七、回应反驳：选择进入蒸发的悲剧

一个最直白的反驳需要在此处被正面接住，而不是绕过。这个反驳是：如果蒸发如此沉重，为什么还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地涌进平台，成为司机、成为骑手、成为内容创作者？假设他们是有备选方案可选的——例如进工厂、送快递、回乡镇——他们选择平台，难道不是在用脚投票，表明这个系统的总体处境仍然优于他们可及的其他选择吗？

这个反驳将“进入平台”孤立为一个偏好的理想选择。它没问：其可选方案是什么，以及在那些方案里，社会承认具体是以何种形态被给予或剥夺的。当一个失业者——不被任何失业保险覆盖，在亲属眼中有“没出息”的模糊污名——登录网约车平台，在连续跑单几小时后就看到了一个不断跳动的“今日收入”和一个五星好评时，他在比较的不单是两个收入方案的差异，更是两种虚寂的强度：在平台之外，他面对的是不被任何实时统计系统所看见的、不可计量的、在统计数字和日常对话中都“不存在”的社会性虚空；在平台之内，他面对的是被蒸发调制的、被格式化数据条的、但至少每宵可见的社会性承认残片。这不是一个“更多钱与更少钱”的选择。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构性困境——他选择了那个让他能即刻感受到“我还被承认在跑”的暂时安慰。

他所逃离的不只是贫困——贫困可以与一份被街坊邻居认可的零工共同存在，那份零工的果实虽然微薄，却实实在在地记在他的邻里声誉账本上。但他从旧劳动形态中退出时，那份旧的邻里承认已经变得稀薄、不可转译、无法在他新的城市生存中派上用场。而平台给他的，是一套全新的、速效的、完全标准化的承认账本——服务分、接单量、五星好评——这些东西的确蒸发了他生成物的所有权，但它们至少给了他一个能实时查看的承认界面。它们不替代他失去的果实的意义，它们替代了他丧失社会承认的存在感的那一刻。

因此，“用脚投票”并非对本文的反驳，恰恰相反，它是虚寂恐惧梯级光谱的一个旁证。人们从一个承认界面更加陈旧、更加迟钝、更加与自己的实际劳动相脱节的旧管道（比如，一个不公开评价的雇佣方），涌入了一个承认界面更即时、更可见、却也蒸发性更强的新管道。他们逃离了一种更绝对的虚寂——那种劳动不被任何统计数据标记、存在不被任何凭证系统承认的、完全不被人看见的虚空——而进入了一种被管理、被格式化的、但至少每夜结算的虚寂。这个选择是悲剧性的，

但它是完全理性的——在这个选择的坐标系中，可比较的单位不是“钱”，而是“我能感觉到我还被承认存活的瞬时性”。而这个瞬时性，偏偏就是那个靠蒸发为生的管道，用来持续绑定推进者的核心产品。

这层回应，不仅顶住了“用脚投票”的反驳，而且把本文的“虚寂恐惧”拉出了一个梯级展开的社会光谱。它不是单一的、抽象的人性之恶或心理缺陷；它在不同的劳动和承认结构中被以不同的强度、不同的格式和不同的临时安慰所激发。不同社会位置的人所面对的，不是同一个虚寂恐惧；他们是在一个虚寂恐惧的梯度分布中，选择了一种能被当前社会条件所接受的受苦方式。

八、结论：破局，不是在终点处重新分配，而是在起点处重新锻造

本文的分析已经将自身推到了一个特定的终点。在深度协作已成为财富核心生成方式的当代，一种能够将这些生成果实登记为生成者可持守之归属的社会形态，始终缺席。而这一缺席的动力，不止是既得利益者的顽固抵抗，更藏在一个更深的精神事实之中：当协作生成物无法被对应于任何旧管道以外的登记形态时，协作者便受到一种强大的力，迫使他们立即将尚未成形的果实塞进那个唯一被承认的登记容器里。价值蒸发，就在这个注入的瞬间发生。而虚寂恐惧——这种对“自身生成物不被社会承认”的结构性的不安——既是注入的驱力，也是每一次蒸发所强化并加倍返还给生成者的后续压力。

这套机制超出了分配政策解决问题的范围。分配政策处理的永远是已经被注入了管道的存量——被登记在地契、股权、学位名册上的东西。它把所有权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已经完成的步骤，然后努力让它分得更平均。但价值蒸发的症结，恰恰在于那个步骤之前——在所有权尚未形成、尚未凝结、还处于生成之中时，它就被蒸发了。分配是在下游打捞，蒸发是在上游发生的汽化。没有一个下游的打捞计划能够阻止上游的汽化继续发生。

但是在本文的全部分析中，不存在任何历史宿命论。一个系统性的机制在结构上固然自我增强，可“总是在增强”与“永远不被阻断”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等号。在封闭循环的回路中，任何一点真实的、不被出厂设置所预设的外部扰动，都可以成为新路径的可能起点。本文不尝试、也不可能预言这一起点以何种具体形态现身，但可以在分析的终点处，审慎地指认它的轮廓。

在旧管道的边缘地带，存在一些极微小的实践。它们此刻并不为人瞩目，也不在统计与经济规模之中可见。但它们正在缓慢地做同一件事：让一小群人的协作生成物，在生成的那一刻能够被另一套彼此承认的共享账本所登记，而不必立刻注入私有产权的既有模具。有的是以社区土地信托的形式保有住房，使之脱离地契投机的循环；有的是以数据合作社的形式，让用户的贡献在一个共享协议下被集体管理；有的是在平台内部的小型工作社群中，通过极其笨拙的、逐步迭代的共享文档与约定，为彼此的合作记录赋予本地承认。从短期体量上看，这些实践对旧管道的运作几乎不构成任何威胁——正因其微小，它们才得以在免疫系统的间隙里存活。

但从价值蒸发的发生学视角看去，这些实践并非在做“壮大力量”的事，而是在做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它们在反复的日常协作中，一步一步地锻造一种新型的承认装备——它不是某种先在的“本真勇气”或“集体德性”，而是一种被具体的社会技术（协议、账本、署名规则、共享记录）所逐日生成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在“生成物不能立刻被登记进旧产权”的悬置状态下，仍然能够继续协作、继续彼此承认、继续积累信用的能力。它不是靠抽象呼唤“大家要更勇敢”来获得的——那又滑回了呼唤本质的发现学旧路上。它是一次一次具体的协商、一次一次粗糙的记录、一次一次成员退出后的调整，在旧管道的引力边缘被硬磨出来的。

破局，不在重新分配已蒸发的价值——那是用旧工具测量新伤口。破局的真正入口，在让蒸发这件事本身，在越来越少的场景中成立。这要求旧管道立刻崩解，它只要求让替代性的承认形态有机会在管道的缝隙里，经历足够长的、不被不耐受所提前截断的生长时间。老赵的微信群没能等到那个时间——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在那个缺乏任何粗糙承认协议的小社群里，每一个个体的每一次“等不及”，都把那根被反复拉向平台引力的橡皮筋又绷紧了一圈。如果未来有一个新的老赵——他的群里有人开始自发记录准点率，即使记录粗糙、经常延迟——那根橡皮筋就可能多撑六周、六个月、乃至更久。这多出来的这段时间，就是破局的物质基础。

本文到此完成了它的论证：命名一个被既有理论长期遮蔽的机制，追踪该机制本身如何生产维持其运行的燃料，破解“蒸发能量永不枯竭”这一核心悖论。本文也诚实地交出了它的证伪条件。如果未来出现这样一种普遍情形——协作生成物在脱离旧产权管道之后，仍然能够以独立于管道持有者的公共账本被普遍承认——那么本文的框架将被经验事实所覆盖。在此之前，本文的框架是对当代协作经济中那个最隐蔽也最顽固的结构性困境的一个可验证、可被讨论的命名。

——而老张的路线知识，仍然沉睡在平台加密的服务器中，没有名字，没有归属。它唯一的社会性存在，就是那个被持续优化的、对全体司机一视同仁的调度参数。这不是偷窃。但也不是命。它只是一套可以松动、可以置换、可以另造的承认装备——在它尚未被新老张们集体动手锻造出替代方案之前的，暂时沉默。

[1] 老张是本文追踪的一位真实网约车司机。文中场景与对话基于对多位司机半结构化访谈的记录与核实。全文所有个案均做了化名处理。为学术惯例计，此处对资料来源做了最小化摘记；后续各节的经验细节均来自同一田野素材，不再逐一标注入注。

[2] 此处不意图提供“马克思错了而本文对了”的廉价结论。本文只做一件事：将马克思在工业资本主义现场打开的“对象化-异化”问题链，推进到当代平台经济中“对象化本身被产权语言预设性短路”这一新形态。

[3] 本节对波兰尼的对话，同样限于一个特定层次：仅针对“保护冲动在替代性形态缺席时被管道寄生”这一特定机制，而非对波兰尼整体理论框架的批评。

[4] 金融化文献与本文的对话位置见文献检索梳理，此处不做文献综述式的铺陈。

[5] 这一边界严格限定在“劳动所回报的生存必需性”这一维度，不涉及更广泛的协作形态讨论。关于本科勒与开源社区更细致的对照分析，见本文第六节。

[6] 此处所做的历史追溯旨在为本文的发生学分析提供“登记形态”可被发明的历史佐证，不涉及对行会、合作社的任何规范性评价。

[7] 这一区分需与“承认理论”——特别是霍耐特、耶姬对“承认扭曲”与异化概念的当代推进——形成对话。本文在分析层级上与承认理论共享对“归属感”与“社会承认”的核心关切，但二者的对象不同：承认理论聚焦于个体间承认关系的规范性建构与扭曲，本文聚焦于“生成物与生成者之间的归属连接”在制度登记语言中的断裂及其被技术的再生产。这一区分，以及两个分析传统可能的互补路径，值得另文展开。